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中国共产党的 国际交往

田永祥 编著

辽海传播出版社

中国共产党的国际交往

田永祥 编著

辽海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共产党的国际交往 / 田永祥编著. — 2版.

— 北京: 五洲传播出版社, 2012.8

ISBN 978-7-5085-2338-5

I. ①中… II. ①田… III. ①中国共产党—国际关系 IV. ①D2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2) 第182581号

“中国共产党”丛书

总顾问 / 王 晨

总策划 / 王仲伟

总监制 / 张雁彬

出版人 / 李向平

中国共产党的国际交往

责任编辑 / 高 磊

装帧设计 / 杨婧飞

制 作 / 北京翰墨坊广告有限公司

出版发行 / 五洲传播出版社 (北京市海淀区北三环中路 31 号生产力大楼 B 座 7 层 邮编: 100088)

电 话 / 010-82005927, 010-82007837 (发行部)

网 址 / www.cicc.org.cn

承 印 者 / 北京嘉彩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 2012 年 8 月第 2 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 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 / 6.75

字 数 / 100 千

定 价 / 58.00 元

目 录

前言 / 1

叁 中共党际交往的重要地位 / 3

党际交往是中共事业和自身建设的重要内容 / 3

中共党际交往是中国总体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 / 5

中共领导人高度重视党际交往 / 6

貳 中共党际交往的原则与方针 / 17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共对党际交往原则的探索 / 17

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中共党际交往原则的丰富 / 18

改革开放新时期，中共党际交往四项原则的提出 / 21

世纪之交，中共党际交往四项原则的丰富与发展 / 23

新型党际交往原则的作用和意义 / 24

叁 中共党际交往的对象与范畴 / 29

革命和战争年代，以共产国际和苏共为主要交往对象 / 29

中华人民共和国初期，以共产党和工人党为主要交往对象 / 31

改革开放后，以各国各类政党为主要交往对象 / 33

新世纪初，明确将世界政党组织及其他政治组织列为交往对象 / 35

肆 中共党际交往的目标与宗旨 / 41

反对侵略和战争 / 41

维护世界和平与稳定 / 42

促进国家关系发展 / 44

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 / 45

伍 中共党际交往的内容与形式 / 47

加强政治对话 / 47

交流治党理政经验 / 48

促进经济合作 / 50

进行国情考察 / 51

开展理论研讨 / 51

陆 中共党际交往的现状 / 63

与亚洲地区政党的交往 / 63

与西亚北非地区政党的交往 / 66

与非洲地区政党的交往 / 67

与拉美地区政党的交往 / 68

与东欧中亚地区政党的交往 / 69

与发达国家主要政党的交往 / 71

与国际和地区政党组织的多边交往 / 72

柒 中共党际交往的特殊作用 / 79

促进国家关系健康、稳定发展 / 79

有助于提高中共的执政能力 / 81

有利于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 82

展示中共的良好形象 / 82

促进世界和平与稳定 / 83

捌 中共对外交往的成就和经验 / 85

结束语 / 99

进入 21 世纪，世界处于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之中，政党在各国政治生活中的作用日益增大，对各国内政外交走向的影响不断加强。与此同时，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发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变化，中国的国际地位日益提高，中国共产党的影响力不断上升，中共与各国政党、政治组织等的国际交往活动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

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初就开始了国际交往活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共开展灵活务实的政党外交，与国际进步力量广泛联系，与各国友好人士密切接触，为推动建立国内和国际统一战线，最终取得中国革命胜利争取到了广泛的国际同情和支持，同时也为支援其他国家人民的反帝反殖斗争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成为执政党，党际交往活动掀开了历史新篇章。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高度重视党际交往工作，亲自参与政党交往实践，较为系统地提出了中共政党外交的理论与原则，奠定了中国政党外交的基石。上世纪 60 年代前后，国际共运内部出现矛盾、分歧，最终导致严重分裂。其间，中共在党际交往中反对大党主义和社会帝国主义，探索自己的路。“文化大革命”期间（1966—1976），由于受到“左”的思想的严重干扰和冲击，中国总体外交严重受损，党的对外工作也遭到极大损害。

1978 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实行改革开放，进入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新时期。进入 80 年代以后，国际形势的深刻变化和国内工作重心的转移，要求中国共产党的对外交往从方针、政策、原则到方法、手段等都必须进行调整。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共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在科学判断国际形势和时代特征的基础上，深刻总结国际共运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提出了建立新型党际关系的思想。1982 年，中共十二大正式提出中共开展党

际交往的四项原则，中共党际交往工作步入了创新开拓、蓬勃发展的新时期。以江泽民为核心的中共第三代领导集体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进一步丰富了中共党际交往理论，开创了中共党际交往的新局面。进入新世纪，在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中共中央领导下，中共在党际交往中不断开拓创新，围绕国家发展大局，超越意识形态差异，寻求不同社会制度和不同意识形态之间的对话与交流，推动建设和谐世界，中共党际交往工作不断谱写新的篇章。

经过长期实践，中国共产党的党际交往形成了自己的鲜明特点。主要表现为：总结历史经验和教训，将独立自主、完全平等，互相尊重、互不干涉内部事务确定为党际交往的基本原则；科学界定党际交往与国家关系的联系与区别，把维护国家利益和促进国家关系发展确定为党际交往的根本目标；顺应时代发展和形势变化，把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为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争取有利的国际环境确定为党际交往的重要任务；不以意识形态论亲疏，不因社会制度划敌友，强调与各国各地区政党和政治组织开展不同形式的交流与合作；不断丰富政党交往内容和形式，交流治党治国经验，促进经贸与人文合作，充分发挥政党交往的各项功能。

中共党际交往不断创造新业绩，取得了与交往对象党互利共赢的效果。对中国而言，党际交往在国家总体外交中的独特作用和优势日趋明显，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党的自身建设中的作用不断增强，促进了中国与世界各国关系的健康稳定发展，展示了中国共产党开明开放、爱好和平的良好形象。从国际层面上说，中共通过党际交往增进了与各国政党的相互理解与友谊，促进了世界进步力量的团结与合作，为维护世界和平与稳定、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新秩序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中共的党际交往不仅造福于中国人民，而且有利于世界政党政治的健康发展，有益于人类和平、发展和进步事业。

目前，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正在顺利进行，中国共产党的党际交往正处在一个新的起点上。中共将继续坚持党际交往四项原则，发展党际交往理论，充实党际交往内容，创新党际交往形式，拓宽党际交往实践，以开阔的视野和不懈的努力迎接各种机遇和挑战，同一切愿与中共交往的世界各国政党和政治组织发展新型的党际交流和合作关系，增进中国人民与世界各国人民的相互了解和友谊，为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和促进世界的和平与稳定作出更大贡献。

中共党际交往的重要地位

中国共产党高度重视党际交往工作，将其看成是党的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加强党的自身建设、提高党的执政能力的重要手段，是扩大党的影响、提高党的国际声望的重要途径，是展示党的良好形象，使外部世界正确了解中国共产党的重要平台。中国共产党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执政党，中共对外交往是中国国家总体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独特优势和不可替代的作用，与政府外交相辅相成、互为补充，共同推动建立和巩固国家关系。中共历届中央领导集体成员都高度重视党际交往理论建设并亲自参与党际交往活动，使中共的党际交往工作得以与时俱进。

党际交往是中共事业和自身建设的重要内容

中国共产党从建党之日起就重视党的思想建设、作风建设和组织建设，同时也把党的对外交往作为整个党的事业特别是自身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共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主要任务是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建立人民民主专政的新中国。通过对外交往，中共赢得了世界进步力量对中国革命的同情与道义和物质方面的支持，对党的成长壮大和中国革命的胜利发挥了积极作用。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成为执政党。建国后的一段时期内，在帝国主义国家对新中国实行敌视、包围和封锁的情况下，中共利用党际交往渠道开展对外交往，推动了国家关系的发展。党的对外交往工作对巩固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扩大新中国的国际影响发挥了重要作用。与此

同时，中共通过对外交往活动，了解、学习和借鉴其他国家执政的共产党的经验和做法，对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拓展国家总体外交发挥了积极作用。

1978年实行改革开放后，中国进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新时期，中国共产党从在相对封闭条件下领导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执政党转变为在改革开放条件下领导现代化建设的执政党。随着中国经济发展和国际影响不断上升，国际社会对中共的关注也不断增强，许多政党与中共建立联系的愿望更加强烈。在这种新形势下，中共要更好地发挥执政党的作用，履行执政党的使命，巩固执政党的基础，需要以更加宽广的视野，学习和借鉴其他国家的政党加强党的建设和治国理政的经验。

进入21世纪，经济全球化在曲折中发展，国与国之间的联系更加密切。中共强调必须善于正确认识和把握国际因素对中国国内事业可能产生的影响，必须善于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更加注重从国际国内形势的相互关系中把握发展方向，从国际国内条件的相互转换中抓住并用好发展机遇，从国际国内资源的优势互补中创造发展条件，从国际国内因素的综合作用中掌握发展全局。要做到这些，加强党的对外交往，对开阔党的视野，把握内政外交之间的内在联系，提高应对复杂国际形势和处理国际事务的能力，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2004年9月，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决定》指出：“无产阶级政党夺取政权不容易，执掌好政权尤其是长期执掌好政权更不容易。党的执政地位不是与生俱来的，也不是一劳永逸的。我们必须居安思危，增强忧患意识，深刻汲取世界上一切执政党兴衰成败的经验教训，更加自觉地加强执政能力建设，始终为人民掌好权，用好权。”要“加强和改进党的对外交往工作”，不断提高党“应对国际局势和处理国际事务的能力”。这就明确地将党的对外交往工作列为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重要内容。中共的对外交往工作与组织工作、宣传工作、统战工作以及其他工作一样，一直是党的事业和党自身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多年来，中共对外交往始终注意把握时代脉搏，围绕党和国家的中心工作，着力于维护国家利益，促进国家关系发展，同时注重交流治党治国经验，在执政党自身建设和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提供智力支持等方面进行了许多有益的探索，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中共党际交往是中国总体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现代国际关系中，外交已经突破传统和单一的模式，发展成为“多轨外交”，其内容涵盖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科技等各个领域。各国各类政党无论执政或是在野，其与他国的党际交往都会对一国的内政外交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执政党更是举足轻重。

党际关系与国家关系属于两个不同的范畴，具有不同的性质和内容。党际关系泛指各国政党之间的关系。由于政党是由某一阶级或立场观点相近的某些阶层组成的政治组织，因此政党交往更多体现了各国间的阶级利益或阶层利益，但执政党之间的交往同时也代表国家利益。而国家关系是主权国家之间的关系，涉及到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安全等各个方面，内容比党际关系更宽泛。发展国家关系要有主权国家的正式官方代表，有外交人员要遵守的外交礼仪和国际规则等，而政党交往则不拘泥于外交礼仪，形式灵活多样。政党交往一般不直接处理国与国之间的具体事务，更多地是通过相互对话和思想交流，增进彼此之间的理解与合作，促进国家关系的建立与发展。

中国共产党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执政党，党的利益与国家利益完全统一。中共虽然不直接代表中国政府同世界其他国家的政府开展外交活动，但由于中共在中国政治体制中处于核心和领导地位，是中国外交战略、路线、方针和政策的制定者，因此中共的党际关系与中国的国家关系高度一致，中共党际交往是中国国家总体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始终以国家利益为最高准则，为促进国家关系发展服务。

在中国政治体制中，中共的核心和领导地位决定了党的对外交往具有不同于其他非社会主义国家政党的重要特点，具有权威性、连续性和稳定性。许多非社会主义国家实行多党制，议会选举后经常出现执政党和在野党地位转换或一些党派从政治舞台上消失的情况，因而这些政党的对外联系经常受到国内政局的牵制，或者难以持续。而中共的对外交往正是因为具有权威性、连续性和稳定性这些优势，使许多外国政党和政党组织很看重、很珍惜与中共的关系。许多国家和外国政党领导人认为，只与中国政府有外交关系，而不与中国的执政党——中共发展关系，则国家关系是不完整、不完全的。

中共处理党际关系与国家关系的联系与区别有一个发展过程，不同时期

有不同的特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共领导下的中国政府不承认原国民党政府同其他国家建立的外交关系，新政府的外交从“零”起步。由于中共成立后陆续与外国共产党特别是苏联、东欧国家的共产党建立了联系，因此依托这种党际关系，中华人民共和国与苏联、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迅速建交。当时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实质上是这些执政的共产党之间关系的扩大和延伸。

正由于这种情况，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虽然在理论上开始区别党际关系与国家关系，但由于当时国际形势的制约和外交任务的需要，在实践中还难以真正将二者区别开来。中国与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基本上等同于党际关系，从属于党际关系，党际关系的亲疏直接决定国家关系的好坏。

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后，中国共产党总结了对外交往和处理与社会主义国家关系的经验教训，邓小平明确提出了正确处理党际关系与国家关系的思想和理论。其基本观点是：要把党际关系与国家关系区别开来，党际关系不能包办或代替国家关系，更不能凌驾于国家关系之上，干扰国家关系的正常发展；党际交往要配合国家总体外交，必须而且也能够服从和服务于国家利益；发展党际关系与发展国家关系有共同的目标和任务，都要围绕和平与发展这一主题，为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政党交往要发挥形式灵活、内容多样的独特优势，在促进国家关系的建立与发展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中共领导人高度重视党际交往

中共历届中央领导集体对政党外交工作一向十分重视并直接指导、大力支持、亲自参与，是中共政党外交的主体。

以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为代表的老一辈革命家十分注重通过党的对外工作渠道获取国际社会的支持，为中共政党外交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奠定了理论和思想基础。他们会见大批外国政党访华代表团或重要人物，亲自做外国政党政要的工作，阐明中共独立自主和相互平等的对外交往原则，同国际共运中的大党主义进行了坚决的斗争。

据不完全统计，毛泽东在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1976年9月逝世的27年间，就先后700多次会见应中共和中国政府邀请访华的来自五大洲100

多个国家的各类客人，共计 3000 多人次。周恩来是中国共产党对外交往的重要开拓者和奠基人之一，他从中国总体外交目标出发，总揽全局，统筹安排，对中共对外工作予以高度重视。他亲自率领中共高级代表团访问欧亚国家，会见各国访华的政党领袖，为中共党际交往倾注了毕生的心血。

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共第二代领导集体在党的对外工作领域开辟了全新的局面。邓小平曾长期主管中共对外工作，多次率领中共代表团出访或参与世界共产党、工人党代表大会，经历了国际共运史上许多重大事件，具有极为丰富的党际交往经验。正是在总结国际共运历史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邓小平准确判断和顺应时代潮流，及时果断地调整了中共对外工作方针，提出了完整的新型党际关系思想理论和党际交往原则，中共对外交往工作从此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发展时期。

以江泽民为核心的中共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十分重视和关心党的对外工作。他们从冷战结束后的国际局势和各国政党变化情况出发，冷静观察、沉着应对，不断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继承、丰富和发展了邓小平党际关系思想。中共对外工作不但经受住了冷战结束后国际局势急剧变化带来的种种考验，而且呈现出蓬勃发展的良好势头。

进入新世纪后，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中共中央直接指导和参与了许多重大党际交往活动，多次率中共代表团出访和接见访华的重要外国政党代表团。2004 年，胡锦涛总书记等 18 位中央领导同志在短短的 3 天时间里，分别会见来京出席第三届亚洲政党国际会议的近 80 个代表团，就有关问题深入做工作，集中展现了中共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求真务实、开拓创新、致力于和平与发展、推动区域交流与合作的良好形象。胡锦涛等中央领导人对中共党际交往工作多次作出重要指示，充分肯定党的对外工作既是“党的事业不可或缺的重要方面”，也是“我国总体外交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对于促进国家关系的建立、巩固和发展，对于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习近平十分重视党的对外交往工作，他在“纪念党的对外工作 90 年暨中联部成立 60 年大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中，通过回顾党的对外工作历史和在各个不同历史时期的重要贡献，指出从中国共产党成立到现在，党的对外工作始终同党和人民的事业紧密联系在一起，伴随着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波澜壮阔的历史进程走过了不平凡的 90 年。他还强调，面对国内外形势深刻复杂的变化，党的对外工作作为国家总体外

交的重要组成部分，任务重、责任大，一定要继往开来、开拓进取、再创辉煌，努力成为促进中国对外关系发展的重要途径，成为展示党的良好国际形象的重要窗口，成为党员领导干部观察和研究世界的重要平台，成为借鉴国外经验、为中央决策服务的重要渠道。

中共领导人与世界各国各党派高层领导直接对话，从国家关系和世界格局、人类和平与发展的全局出发，探讨重大问题，交换意见和看法，增进了中共与外国政党的相互了解与友谊，促进了中共对外交往工作的开展。



毛泽东主席同亚非拉朋友在一起。



1970年3月，周恩来总理在北京会见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执委会主席阿拉法特，表示坚决支持阿拉伯各国人民和巴勒斯坦人民的正义事业。



1989年5月，邓小平在北京同苏共中央总书记戈尔巴乔夫会晤，中苏关系实现正常化。



1990 年，江泽民主席在北京会见土耳其祖国党主席阿赫迈德·阿尔巴伊拉克。